



大革命时期荆州农民运动

□ 陈礼荣

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党组织就十分重视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中来的这一重大问题。

1923年1月1日,彭湃在广东省海丰县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县农会;当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号召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第一次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年的7月间,由中共武汉区委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委便成立了暑期农民运动委员会,发动各校进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利用暑假返乡的机会,开始进行农村情况调查活动,为开展农民运动做好了前期的组织发动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26年5月3日起至9月11日,毛泽东同志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两湖地区培养出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成员。这一届讲习所历时4月有余,是广州历届农讲所中历时最长的一届。

1925年初,在武汉读书的江陵籍学生戴绍鼎、赵本长与田其宽等作为中共党员,奉命回到家乡普济观田家坊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深入到穷苦农民之中,向他们宣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同年秋,戴绍鼎等以串联好的贫苦青年农民为骨干,率先在田家坊及周边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入冬之后,附近傅家湾又有王子香、傅在举等毕业生回到普济,他们入党后被安排为农协的专职工作人员。由于机构健全,人员配备完善,到了第二年的春节前后,江陵普济一带已拥有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这天,普济观镇举行了区农协成立大会,方圆数十里的农协会员纷纷赶来参加。在这次群众集会上,当地有5名土豪劣绅被农协会员押到台上示众警告,接着人们又分成三路,分头去各乡、村游行,以扩大农协的声势。当第一路游行队伍抵达傅家湾时,农会会员们捉到当地一贯作恶多端、鱼肉乡民的大土匪傅传玉和李少先,要求农协予以惩办。待三路游行队伍会合后,农协主席王子香当场宣布,将傅、李二人就地处决。这一壮举,大快人心,极大鼓舞了农协会员投身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积极性。

江陵普济观镇农协成立的这一大壮举,充分证明了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高的革命积极性。在旧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受压迫最为深重:大多数土地都被达官贵人、豪绅地主所瓜分,农民不仅缺少田地,地课赋役也十分沉重,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在经济上受到各级反动统治政权以各种方式征收的苛捐杂税盘剥,以致生活无着,难以维持,时时承受着随时可能破产的威胁。两湖地区靠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又有辛亥主义的革命渊源,因而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比其他省份显得更高一些。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共有90万人,湖北农民协会就占有7万2千人。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进行了一

系列反对军阀和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这次由共产党人主持领导、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普济农协的这一行动,使广大贫苦农民认识到了,农民协会是贫苦农民自己的组织,有了这一组织,就能够将长期欺压自己的恶人打倒。与普济相毗邻的沙岗,也于1925年夏天成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这里的领导人是陈海波、彭之玉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当地的农协成立后,将当地反动土绅张仁科戴高帽子游乡。而在沙市长江对岸虎汛区的虎东地区,也有共产党员林维章等于1926年7月成立的“江陵县晋金州第一村农民自治会”。该自治会制定有书面的会章,还到沙市营产局备了案,其宗旨是为维护农民利益,反对土豪劣绅与保甲组织相互勾结,随意征收苛捐杂税。

1926年春,中共党员刘绍南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戴家场(今属洪湖市),开展农民运动。他深入到贫苦农民之中,向农民、渔民宣讲受压迫、遭剥削的社会原因,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与残暴。到了春节期间,他还把自己家里的长工和佃户召集起来,当众宣布把家里的土地分给他们。他这种破坏闹革命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震撼了当地群众,觉醒了的农友们行动起来,掀起了抗租、抗息、抗税的浪潮。几乎在同一时期,在湖北政法学校学习的熊传藻也作为中共党员被派回新堤,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和发动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加入共产党,先后建立了新堤总工会和周边乡村的22个农民协会。在农民运动中,进步青年彭国材、涂位云、贺阔、李德珍等20余人加入共产党,成为这场伟大斗争的中坚骨干。

公安县的农民协会筹备处于1927年2月成立,至当年夏天,便成立了8个区农协及92个乡农协,会员达4万多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其他各县都相继成立了农协组织或农协筹备委员会。农民协会组织的普遍建立,推动了荆楚大地农民运动的空前发展,“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响亮口号,在短时间里便响彻大地。

石首的农民协会成立于1926年5月。其先,李良耀、李恒久等人在九佛岗、石堰、鹿角头一带先后成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廖学愚在八十丈、调张口也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而屈阳春、冯世华等人同期在刘家铺、章华港、永合院一带成立了秘密农协……1927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李良耀等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灭土匪,打土豪,劫富济贫”的行动口号,组织农民协会会员杀掉了当地土匪吴汉卿、赵志清,将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土豪劣绅立即报复,烧毁了农民协会领导人的房屋10余栋。农民协会及时组织会员进行反击,手持梭镖、马刀的农协会员处死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10余人。

1927年8月15日,监利中共党组织还秘密召开农协分会联席会议,互相交流经验。不久,党组织了解到监利大劣绅谢良弼吞下了省政府下拨给灾民的救济粮的情况后,立即组织1000多名灾民将谢的住宅团团围住,不但要谢吐出受了侵吞的救济粮,还迫使谢交出罚谷100担并当众认错道歉。



姓名:戴绍鼎
籍贯:江陵普济
生平简介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赵本长、田其宽、黄震远、白正秀一起成立了江陵县第一个党支部-田金南支部,并任书记。历任江陵县委员、县委书记、宜昌县委书记等职务。
1927年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1931年冬,在指挥战斗中不幸牺牲。

农民协会组织的普遍建立,推动了荆州农民斗争的空前发展。在严厉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同时,现荆州市辖区各县的农民协会还把斗争矛头直指向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侵略势力。松滋沙道观天主教堂占地约3000平方米,1903年由比利时宜昌教区的外籍神甫兴建,掌管着沈市、采穴、米积台、朱家埠、老城、天星市、簸箕岗等六个地方的教会事务,共有教徒140余人。两湖地区大革命运动兴起后,在松滋传教的美、英、葡等国神甫、牧师全部撤离,他们离开前曾各自指定代理人管理教会事务。这些代理人经常仗仗外国的特权,在地方上挑起讼事,强夺田产,可说是为所欲为。在松滋兴起的反帝浪潮中,由农民协会出面断然没收了沙道观天主教堂,驱逐了代理人;而松滋老城、白溪桥、天星垸、杨林市、刘家场等地的农协于同期也继而奋起,行动起来,没收了各自所在地由外国教会所把持的财产,另将其所有的土地、房产及其收纳的地租充公。

随着荆州各地农民运动的广泛开展,维持地方秩序成为农民协会的又一重要工作。为了剿除匪患,各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武装组织,其中实力最强者,当数由公安县除暴安良委员会所掌握的农民武装。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入湖北,各地的武装斗争大体结束。这时,中共湖北区委及时发布了《对湖北目前几个重要政治问题的意见》重要文献。其中列专文明确提出“分区肃清土匪,务求使久受蹂躏之湖北人民稍得安宁,欲达到此项目的,必须政府与人民合组除暴安良委员会。”公安县由于历来匪患甚炽,全县8个区都分别成立了除暴安良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过渡性的军事政权性质,其活动宗旨具体设定为宣传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打击土豪劣绅,清匪和移风易俗等五大任务。不久,各区又将当地原有武装加以改组,组成“农民自卫队”,置于除暴安良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并于1927年6月由中共公安县委将这些农民武装统一编建为农民自卫团;樊学赐任团长,杨荣祥任副团长,下设8个大队,共3000余人,五六百支枪,成为鄂西地区一支实力较强的农民武装。当期组建之初,便痛击长期在安乡、澧县、公安等三县交界地带骚扰多年的湘籍巨匪张玉龙部,大张了农民协会的声势。

大革命时期荆州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兴盛蓬勃,构成了本地区近现代历史上一道耀眼辉煌的亮色。这场运动虽因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所夭折,但为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夏末于危急关头毅然发动的秋收暴动,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准备了一大批骨干,继而为湘鄂西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谱写出一部有声有色的序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一页光辉的篇章。

明代荆州籍进士略考(六)

□ 余大中

刘寓生

刘寓生,字奇进,号白潭,湖广石首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甲第四十八名进士。同科状元顾鼎臣,榜眼董纪,探花谢丕。同科二甲进士出身共95名,三甲同进士出身共205名。

嘉靖初年,刘寓生任巡仓御史,曾经上疏:运粮加耗之弊,有太监茶果,每百三厘九毫,岁银1.56万两;经历司,该年仓官,各年仓官,门官门吏,新旧军斗,俱每石一厘,共银1.6万两;日会钱者,日小汤光银者,各每石一分,共银8万两;日救解面银者,每石五厘,计银2万两,皆民脂民膏,乞痛革其弊端。

正德年间,刘寓生任巡按贵州监察御史,与刘瑾、王阳明这两个知名人士相关。有文献认为刘寓生是权宦刘瑾的党羽,也有文献认为二人是政敌。清初喻嘉才《绣林景献记》写道:“刘公白潭,廷杖折刘瑾,官中有小御史之呼。”

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触怒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与刘寓生颇有交情。也有文献认为,刘寓生是刘瑾派来贵州“刷卷”的。所谓刷卷,就是稽查所属衙门审理刑狱案件情况。

张子言

张子言,生卒年不详。湖广石首人,天顺四年(1460年)三甲第二十名进士。同科状元王鏊,榜眼李永通,探花郑郊。同科二甲进士出身共50名,三甲同进士出身共103名。

有文献记载,张子言曾任广东按察金事,是辅佐按察使、分领各项事务的官员,品级为正五品。还有文献记载,张子言曾任南京刑部主事。张子言的孙子张璠,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是明代石首“三阁老”之一。清初喻嘉才《绣林景献记》写道:“祖孙济美,不独张子言一家。”讲的就是张子言、张璠祖孙二人。

刘隽

刘隽(?-1408年),字子士,湖广江陵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甲第十二名进士。同科状元丁显,榜眼练子宁,探花黄子澄。同科二甲进士出身共107名,三甲同进士出身共324名。

刘隽初任兵部主事,后任兵部郎中,遇事善于剖析,勇于决断,深得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建文年间,明惠宗朱允炆任命刘隽为兵部侍郎,正二品。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刘隽升为兵部尚书。

永乐四年(1406年)明廷出兵安南,刘隽奉命参赞军务,行动缜密勤敏,佐画筹策得宜,班师后被赏以厚赏。不久,安南简定叛明,自称“日南王”,刘隽奉命参赞黔国公沐晟的军务,往征简定。

永乐六年(1408年)明军生擒江(今属越南河内)战败,抵达大海海口时陷入重围,刘隽自缢而亡。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以刘隽不屈,赠太子少傅,谥节愍。

王恂

王恂(?-1453年),字用诚,初名王振,后改王恂,湖广公安人,宣德五年(1430年)三甲第二十七名进士。同科状元林震,榜眼龚钰,探花林文。同科二甲进士出身共35名,三甲同进士出身共62名。

中进士后,王恂选为庶吉士。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四年(1439年)任翰林院检讨,参与编修《宣宗实录》。正统十三年(1448年)任翰林院修撰。正统十四年(1449年)任大理寺右寺丞,巡抚贵州。景泰三年(1452年)任右春坊右庶子,景泰四年(1453年)任国子监祭酒。

国子监,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隋朝以后一直是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明代国子监,创于明太祖朱元璋初定金陵时,即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建都南京后,重建校舍于鸡鸣山下,改学为监,故称国子监。建元大德十年(1306年)北京国子监始建,初称北平郡学。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南京国子监学生已有八千多名。永乐二年(1404年)北平郡学复称国子监。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改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亦称“南北两雍”)。永乐二十年(1422年)国子监学生近万人,盛况空前。王恂担任国子监祭酒,就是当时最高学府的“校长”。景泰四年(1453年)九月,王恂罹患风疾,逝于任上。

汪浩

汪浩(1417年-1473年),字弘初,湖广石首人,景泰二年(1451年)二甲第34名进士。同科二甲进士出身共75名,三甲同进士出身共123名。

汪浩最初授官金事,相当于现在的副职或者助理。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升任金都御史,巡抚四川。明代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金都御史。又依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

汪浩巡抚四川期间,参与镇压四川农民起义首领赵保,为朝廷立有功劳,因此升为副都御史。后来,汪浩被弹劾,谪官开平(今属广东江门)。

地道楚味“七星宴”

楚味荆州

怀旧,即怀念过去的人或事。在值得怀旧的物中,食物常常成为抒发怀旧情绪的主题。

1896年,长江北岸的小城沙市,与重庆、苏州、杭州诸城镇比肩而立,共同成为通商口岸。如今,百余年前,当年与沙市并驾齐驱的苏杭,还有溯江而上的重庆,早已今非昔比。

从泛黄的图片或尘封的史料中,我们仍然可以读出沙市开埠后的景象:洋码头的喧嚣,来自天南地北的“十三帮”以及吸引乡邻的会馆。岁月如梭,曾经的它们与沙市的阡陌街巷一样渐行渐远,烟消云散。

江汉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但旧时这片广袤的天地里,陆路通途却极其闭塞,那条通往汉口的公路初建时日亦不过是1970年。彼时,维系江汉平原粮棉外埠贩运以及荆楚人家的柴火油灯……无不依赖门前那条日夜东流的大江。触舟千里,帆樯如云的沙市港,承载着巨大的河运功能。“短衣帮”清晨饮酒所谓的“早酒文化”由此而生。

流通带来了繁荣,繁荣促进了流通。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八街九陌热闹非凡的沙市,食肆林立,市井熙攘。长江上游乃至下游的饮食花样汇入沙市,以至于今天街头巷尾的“过早”林林总总。如今,仍可捕捉它故乡的身影,亦可溯及它原产地的溯源。倘若从饮食史划分沙市时代,清末民初最为鼎盛。

达官贵人之于钟鸣鼎食,行商坐贾之于接风饯行,百姓婚嫁之于桌席,那些厨灶后的故事,那些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荆楚味道,究竟是什么呢?

明清时期筑就的荆州古城墙,屹立于荆江北岸的万寿宝塔、洋码头,它们是真切切切的物质文化遗产,它们至今耸立那里,触手可及。与之相对应的传统技艺,却没有固定的形态,人们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庆幸的是,流行于清末民初乃至民国时期的高等级宴席制作技艺及其完整的筵席菜谱,在几位耄耋文化学者的见证下,重见天日。非遗传承使得百年前觥筹交错于席间的沙市七星宴,原汁原味地再现餐饮江湖。

“七星宴”亦做七星箭和七星钱。年逾六十的荆沙土著大都谙熟此名,因为当年他们喜结良缘的洞房——七星宴,给他(她)们留下了没齿难忘的记忆。

七星宴是荆楚饮食的经典。七个“硬菜”从花样繁多的楚菜中脱颖而出,涵盖湖鲜、肉食、禽蛋。其间,半数以上被收录《中国菜谱》而成为闪耀着光芒的中国名菜。至高无上的楚味臻品,没有给后世留下了点可以修改空间。如果有人要从味型上如何阐述楚味?唯七星宴即可诠释矣。

其实,组成“七星宴”中的个体,虽然游离于七星宴菜谱之外,却从未离开荆沙人的餐桌。

“杂烩头子”,带有所向无敌的浓郁楚蛮色彩。然而,当下多人对之不识。它现在的名字冠上了鱼米之乡的域名,即老幼皆知的荆州鱼糕,粗犷瞬间嬗变成委婉。

“头子”即酒筵中的头号珍馐美馐,有人不解,江汉平原淡水鱼太过平凡,何谈名贵?杂烩头子的珍贵源于繁复的技艺而非唾手可得的美味。

率先上桌的杂烩头子氤氲飘香,海碗垫有石滚鸡蛋,辅之爆炒鸡杂劈头浇下,竹箸之下鱼糕摇曳震颤,对折不断,淡水鱼升华到最高境界。杂烩头子诸味合一,肉有鱼味,鱼有肉香,故荆沙有无糕不成席之说。

豆豉扣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先煮后炸再炒金酱,尔后分切成块,以浏阳豆豉打底,置于笼中猛火蒸制透于盘中。持久蒸汽之下,其肥腴化为无形,扣肉表皮色如琥珀,肥瘦层次分明,入口即溶于舌尖。

皮条鳊鱼,黄鳊鱼饽饽的功夫菜。黄鳊宰杀切成寸段,历经三种层次的沸油炸炼最后汇入糖液涂挂甜霜,皮条鳊鱼成菜甜酸适口,晶莹剔透,其制作技艺,业内众多人士皆望其项背。

红烧全鱼,选湖中鲜活鲢鱼,剖成花刀,裹少许淀粉油炸炸定。鱼肉刀割之处在油中绽放开来犹似龙鳞舒展。红烧全鱼考验大厨的精细,成菜业经油炸烹饪,仍然鳊鱼齐全品相完整,那条卧于盘中散发着诱人鲜香的鲢鱼,依然呈水中游弋模样,年年有余由此而来。

腾油脂中爆炒,菱形玉兰片青红椒配上黑木耳与三鲜合炒,浓浓的脂香让尔欲罢不能。三鲜风味南北皆有,但选料多有不同,亦有将韭菜与鸡蛋充数者,如此,降低了成本却失去三鲜的高贵。

黄焖圆子,选肥瘦浑然一体的猪后臀尖,斩剁成糜,拌入适量淀粉未起胶凝,再入沸油炸制定型。网是厨师未语,即注入黄花木耳及少量高汤烹入入味,再勾薄芡出锅。“圆子”因地域不同叫法亦不同,北方称之丸子。“圆子”是南方特有的称呼,象征着事事圆满,万事如意。

百年前的沙市宴席菜谱,为什么取名“七星宴”?老天王酒楼掌门人,“七星宴”非遗传承人王良英女士如是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7有吉祥、尊贵、博大、好运的寓意。世间万物皆与数字7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一个星期有7天,人的头部有7窍,光彩有7色,人的感情有7情,苍穹北斗有7星,天上仙女有7位,诗歌有7律……佛家倡导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七级浮屠概指7层塔,7是最高等级的佛塔。

“七星宴”组合7种楚地风味,百年来自荆楚民众推崇备至,在外来食物的冲击下,在创新产品的围剿中,七星宴仍七星高照,立于不败之地。除了神奇的“7”留给人们无尽的美好遐想,盖因为它作为厨房鼻祖的地位无人撼动。

我以为是,了解楚味,探索楚味,品尝楚味,传承楚味,当从历经百年而不衰的七星宴开始。

(选自《荆州记忆》)